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发生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

李俊文 白 鹤

摘 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中发挥着方向性和根本性作用,其发生逻辑源自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化建设的经验淬炼。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为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站稳政治立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加强对文化发展方向和整体格局的把握,以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为重要目标。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保持文化发展方向稳定、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党的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26)05-0014-12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1]^[2]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不仅关乎意识形态安全和价值引领,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系统阐明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发生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对于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述评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命题。围绕这一主题,学术界从多视角展开了系统探讨。2023年以来,随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被系统阐发,学术界围绕其内涵要义、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实践理路、话语体系和概念史演进等

方面展开了较为集中的讨论,研究正在由命题阐释走向体系化建构^[2]。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形成了若干研究方向。

第一类研究聚焦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实践。束锦通过考察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和思想领导的重要论述,认为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拉开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序幕,并从革命实践中奠定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基础^[3]。吴肖兵从近代中国文化觉醒、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三个历史前提出发,考察党的文化领导权如何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确立并得到巩固,指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应坚持一元主导、优化政党形象并凝练中国话语^[4]。蔡佳卉、张海防运用概念史方法,梳理党的文化领导权从救亡图存语境中的“思想领导”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研究”(2025ZXSCX02)。

作者简介:李俊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白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到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和强国复兴语境中制度化、体系化表达的演进过程,说明该概念并非对西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文化实践中形成的话语创新^[5]。赵乐则从理论建构、历史演进与实践理路三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发展过程,指出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实践应与时俱进^[6]。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中,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断被赋予新的政治与文化意涵。这类研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实践基础,但其重点多放在历史性展开与经验总结上,对于新时代语境下这一命题何以成立的理论根据、核心要义及其内部各维度之间的结构关系,尚有研究空间。

第二类研究侧重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内涵,这也是当前学术界研究较多、但内部路向并不完全相同的一类研究,重点回答“何以提出”与“何以成立”的问题。麻磊认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涉及党的领导、人民立场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维度,强调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7]。陆寒从话语体系建构角度展开论证,认为党的文化领导权话语体系并非既成概念的自我规定,而是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形成的实践话语体系^[8]。吴林龙、马浩冉则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出发,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百年来制度化建设经验的深化发展^[9]。但现有成果多是从单一视角切入“形成依据”或“生成逻辑”,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特性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揭示仍可进一步深化。

第三类研究则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关注新兴科技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的影响。王岩、杨鑫认为,数智技术赋能党的文化领

导权建设,是数智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要求,同时指出“话语解构”“数据失范”等问题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形成挑战,需通过技术治理、安全体系建设和完善法律制度等路径加以应对^[10]。朱继东、李泽中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开辟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空间,其拟人化与交互性特征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应强化党领导下的技术自主创新,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传播^[11]。张琛、王涛认为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路径与治理方式,新时代需准确把握其技术性与人民性、开放性与导向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其指出,应通过筑牢政治根基、强化价值引领、完善文化治理格局和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推动党的文化领导权实现守正创新发展^[12]。王岩、高天赐进一步提出,数智技术重构了新时代文化生态,使文化强国建设面临新的矛盾与张力,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需通过引领数智文化发展、主导数智文明建构、把握网络舆论导向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持续提升党的文化领导能力,巩固党在数智文化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13]。这一方向拓展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研究的时代视野。

基于此,本文围绕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发生逻辑、核心要义以及实践进路展开综合性分析。第一,在系统梳理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依据的基础上,不再重复既有研究对“形成依据”的简单列举,而是立足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结构,揭示其内在发生逻辑。第二,提炼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义,着重阐释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及正确把握党性与人民性、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等方面所蕴含的深层理论内涵。第三,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进路展开系统论证,重点围绕加强党对文化发展方向和整体格局的把握,

持续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展开分析。

二、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发生逻辑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逻辑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化建设的经验淬炼。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点,才能理解党的文化领导权在理论上为何具有必然性,在制度上为何具有合理性,在新时代条件下为何具有不可替代性。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传承与发展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要回答党的文化领导权何以成立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党的文化领导权就容易被理解为文化工作中的一般要求,甚至被误解为对文化活动的外在干预。实际上,党的文化领导权之所以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属性、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说明了文化为什么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为什么必须由先进政治力量引导。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首先回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不是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精神现象,也不是可以自我封闭、自我运转的观念体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也就是说,文化并非悬浮于社会之上的抽象精神现象,而是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人们在现实活动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意义认识的集中反映。文化既然植根于现实生活,就不可能脱离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也不可能不受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一步说明,文化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反过来作用于现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5]^[15]文化一旦形成,就会通过价值判断、意义表达和社会传播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社会风尚、社会认同和社会秩序。文化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边缘领域,而是关系社会凝聚、精神塑造和价值引导的重要力量。

正因为文化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文化发展不能没有方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6]文化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存在脱离社会关系的纯粹文化空间。文化总是体现一定的利益关系、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谁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谁就会对人民群众的认知方式、判断标准和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先进思想不去占领文化阵地,错误思想就会乘虚而入;如果社会主义文化未发挥引领作用,其他价值观念就可能冲击主流价值观进而削弱共同理想信念。可见,文化必须引导,而且必须坚持正确引导。

既然文化必须坚持正确方向,那么这种引导责任由谁来承担?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不是离开历史主体去讨论文化方向,相反,它始终强调科学理论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成为现实力量。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5]^[15]这说明理论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它必须通过一定的主体力量、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进入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7]^[44],其所代表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7]^[42]。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承担文化引导责任,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把科学理论、人民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统一起来。

文化之所以需要引导,是因为它对社会生活能够产生深刻影响;文化之所以需要正确引导,是因为它总是体现一定立场和方向;文化之所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因为只有先进

政党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转化为持续发挥作用的现实力量。党对文化的领导,通过理论武装、组织引导和制度保障,使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服务人民、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离开党的领导,文化可能走向分散、失序,难以形成共同价值和共同精神;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化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难以真正肩负起凝聚人心、培根铸魂的使命任务。

(二)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

“坚持以永恒发展的观点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18]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19]2-4}。这揭示了中华文明内部最为基础且最具生命力的结构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德治、尚教化、崇整体、贵和合等基因,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滋养与历史资源。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在于其在历史发展中保持着显著的连续性。文明典籍、礼乐传统、伦理秩序和政治理念代代相承,使文化始终作为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而存在。《论语·为政》提出“为政以德,其譬如北辰”^[20],强调德治与教化之不可偏废;《礼记·礼运》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1],指出文化、伦理与政治秩序的内在一致性。这表明,文化不仅具有精神教化功能,更在深层意义上构成维系政治秩序与社会整合的重要一环。这种文明连续性,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稳定性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使党的领导权能够在文明长河中找到价值承续的方向与意义。从文明发展经验看,正是依托稳定的文化价值体系与持续的政治整合力量,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长时段连续发展,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新时代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然而,延续并非守旧。中华文明在继承中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形态,形成卓越的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22]“生生不息”中的“生生”意指不断生成,“不息”意指永续不断,二者结合指向文明内部的自我更新。从先秦百家争鸣、两汉经学体系的建立,到佛教的中国化、宋明理学的系统化发展,再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改造,中华文明始终在对传统的重释中寻找其时代价值与实践表达。这种在继承中不断生成新形态的特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更新能力,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显著的整体结构,其统一性既体现在“天下观”“公天下”等整体理念上,也体现为多民族、多区域背景中形成的共同文化认同。《周易·系辞》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23]揭示了中华文明在面对和处理社会差异时所呈现的整体观与协调性思维。这种以整体秩序统摄差异结构的文明理念,使中华文明在多元结构中始终保持文化认同与政治秩序的内在统一。长期形成的文化统合能力,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文明传统的内在逻辑,使文化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价值整合、社会协调与共同体塑造的重要作用。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看,国家统一与文化统一始终相互支撑,这一经验表明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由具有高度组织力与历史使命的政治主体承担文化领导责任。

在开放与交流方面,中华文明表现出突出的包容性。从佛教东渐并完成本土化,到唐代文明吸纳西域文化元素,再到近代对科学技术与制度理念的吸收,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方式对待外来文化,并通过自身价值体系对其进行再诠释和整合。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使其在新时代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对外文化传播体系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使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外向表达具备文化主体性与价值稳定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进一步构成其价值取向

的重要维度。《尚书》的“协和万邦”和《论语》的“和而不同”，均体现了中华民族倡导和谐、反对以武力征服他者的文明传统。这一和平理念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史的重要特征。正是这种个体特征，使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国际传播、文明交流与文化对话中能够以和平共生、互利共荣的姿态展开，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表达方式。

综上，连续性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历史根脉，创新性赋予其现代转化能力，统一性构成其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础，包容性支撑其文明交流的开放取向，和平性塑造其国际传播中的文明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德治传统、文化教化传统以及整体治理理念，使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承担着国家整合的功能并成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资源。

（三）历史脉络：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化建设的经验淬炼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文化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丰富的理论成果。它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组织群众、凝聚精神力量的伟大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主要表现为对思想领导、宣传动员和革命文艺方向的高度重视。面对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任务，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革命不仅是武装斗争和政权斗争，也是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4]这表明，党已经把思想领导置于全部领导的重要位置。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25]这意味着文化必须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革命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思想，虽然尚未形成“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表达，但其基本内涵已经确立，即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一步同国家建设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已经由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国家，文化工作也由服务革命斗争转向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全局。针对社会上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26]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大规模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广泛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并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相适应的宣传教育和文化事业体系。由此，党的文化领导开始从革命时期以宣传动员为主，转向以思想教育、制度建构和价值塑造为主。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思想解放和社会深刻变革中不断丰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文化领域日益活跃，思想观念更加多样。邓小平同志强调：“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27]江泽民同志指出：“各级党委都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28]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29]。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党对文化领导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逐渐涵盖意识形态安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思想文化阵地等内容。

进入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实现了标识性概念凝练提出和理论体系系统构建的新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作出系统阐述，使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特别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被概括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这体现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由长期存在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实践原则、工作要求和思想经验，上升为具有系统性、学理性和

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命题。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经历了革命时期的初步奠基、建设时期的制度展开、改革时期的深化发展和新时代的系统成熟。这一过程表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不是静止不变的概念,也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文化领导权”话语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地位、文化功能和文化建设规律认识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三、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涉“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这一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关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和发展方向。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建设并巩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体现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把握上。意识形态工作在文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立场引领社会思想。只有把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贯彻到制度建设、责任落实和法治保障之中,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在实践中发挥持久而稳定的作用。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30]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回答时代课题,从而在复杂历史条件下把握发展主动权。意识形态在文化体系中具有方向性和引领性作

用,直接关系到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和国家赖以建立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统领性作用。正因如此,只有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1]落实到文化领域,就是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具体而言,要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贯穿到理论宣传、新闻舆论、文艺创作、教材建设、网络传播等关键环节,避免出现职责分散、衔接脱节等现象。意识形态工作覆盖面广、关联领域多,只有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才能把宣传部门、教育系统、媒体平台以及基层文化阵地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上下贯通、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从而将党的文化领导权真正落实到文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

第三,健全责任体系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保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必须切实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意识形态工作如果只停留在一般部署层面,就容易出现责任悬空、落实递减的问题。要提高领导实效,关键在于把责任细化到具体领域、具体部门和具体岗位,形成清晰的责任链条。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学校、媒体和基层文化阵地,都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做到任务明确、职责清楚、考核可见,解决工作中责任边界模糊和末端落实不足的问题,使意识形态工作从会议要求、文件要求转化为日常运行中的刚性要求。责任体系越清晰,党的领导越能深入文化运行的实际过程,意识形态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越有保障。

第四,推进法治建设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支撑。随着文化市场发展、传播技术变革和网络空间扩展,意识形态工作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明显增多,仅靠临时性措施难以适应发展需要。必须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把相关要求落实到法律法规和管理细则之中。通过完善文化市场监管、网络传播治理、公共文化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进一步明确行为边界、压实平台责任、规范传播秩序,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支撑。

总之,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首要环节。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进法治建设,才能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确保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实践中不断巩固。

(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也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基础。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2]这深刻表明,新时代文化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健的文化根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立足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实际,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加以把握。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推进文化建设,才能既坚定文化自信,又把握文化发展方向。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3]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框架,构成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胜法宝与根本方法论原则。“第一个结合”确保文化方向的科学性与文化建设的创新性,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核心,始终保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第二个结合”保障文化根脉连续性与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在更为厚重的历史纵深中,夯实并拓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础。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明确了目标任务。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是孤立展开的,而是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民族复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在新时代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其作用也更加突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关系文化发展方向,也关系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凝聚和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作出系统论述,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是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和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才能不断增强文化建设的方向感、主动性和创造力。

(三)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持党性与人民性、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守正与创新的统一。这两组辩证关系共同构成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在结构逻辑。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要充分体现党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保障,它为文化发展方向提供了坚定的理论和政治支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34]党性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它保证了文化发展的科学性和稳定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

志。”^[35]党性绝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与人民性构成辩证统一关系。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真正创造者和受益者。

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统一,要求党在文化领导中既要保持党性基础的稳定性,又要尊重人民对文化的创造力。党引导和激发人民的文化潜能,使人民不仅能够积极参与文化生产,还能够文化创造中展现出自我价值,从而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动创造者和推动者。这一过程的实现,依赖于党通过制度安排、文化教育等途径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最终推动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另一个基本原则体现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9]11} 这一论断强调了守正在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中的重要性,它确保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偏离根本方向,不丧失其根本价值。

守正体现的是文化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确保文化始终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对人民的引领作用。而守正并不意味着固守不变,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始终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当今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特别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36]。文化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播机制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必须通过创新确保文化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是文化适应社会转型、科技变革和生活方式变迁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文化形式和传播途径的变革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马克思主义

理论强调,思想的变革需要经由社会实践不断验证其真理性;同样,文化的创新也必须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检验其合理性,才能够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推动社会的进步。

守正与创新是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守正确保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性,而创新则推动文化在新时代中保持活力,确保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通过党性和人民性、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党的文化领导权能够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作用。这一辩证统一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要求,更是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党性确保文化领导权在理论上的稳定性和正确性,人民性则推动文化建设更加符合人民需求和时代要求。守正保证方向,创新保证活力;守正赋予文化建设以稳定性,创新赋予文化建设以时代性。二者的统一不仅构成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论,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四、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把理论原则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方法要求,使党的领导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进路,取决于党对文化发展方向和整体格局的统筹把握能否真正落到实处,以及在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实践中能否形成稳定有效的工作格局。

(一)必须加强对文化发展方向和整体格局的把握

这一实践进路建立在对文化地位、文化功能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调整,传播方式快速变革,文化形态更趋多样,文化建设面临的任务愈加繁重,文化发展方向、价值取向和整体协调等方面的矛盾更加凸显。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进路,应从方向引领、价值统领和整体把握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必须加强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

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37]方向问题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文化发展总是同国家发展目标、社会制度和文明走向联系在一起。新时代文化建设承担着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其发展方向必须始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保持一致,成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把握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要在思想观念日益活跃、文化传播环境深刻变化的现实条件下,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第二,必须加强对文化价值体系的有力统领。文化价值体系是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维系社会认同和精神团结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38]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价值问题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文化价值体系一旦出现动摇,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就难以形成共同依据。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进路体现在能够将理论引领、价值塑造和文化实践贯通起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文化建设各方面,并转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循的价值准则。

第三,必须加强对文化整体格局的统筹把握。文化建设涉及思想观念、制度建设、内容生产、传播体系等多个方面,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整体性的事业。“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1]17-18}各个环节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单一方面的推进难以支撑文化建设全局。新时代党通过对文化的领导,从全局上把握文化发展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服务和文化治理协调推进,使文化建设形成目标一致、内容衔接、力量协同的整体格局。这样的统筹把握,既体现了新时代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

识,也体现了党在文化领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

(二)必须以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为重要目标

在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总体布局中,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长远发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础。”^[39]对文化建设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立足文化领域实际,不断健全文化治理体系,持续提升文化治理能力,把党的文化领导权落实到文化建设和文化运行各方面,文化建设才能在新时代形成更加稳定、更有秩序、更加有效的治理格局。

第一,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重点在于优化治理主体配置,提升协同治理能力。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和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体更加多元,文化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参与方式也更加复杂。面对这种变化,单一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要求在把准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推动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文化治理,形成分工明确、衔接有序、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党在其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通过明确政策导向、制度规范和工作要求,确保各类主体始终在正确方向上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治理主体配置的优化,还体现在各方面履职能力、协作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提升上。文化治理成效,不仅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健全,也取决于各类主体能否把制度要求落到实处。只有把治理体系建设同治理能力提升相结合,才能把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二,持续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要求文化治理方式不断走向成熟和定型。文化领域事务复杂、覆盖面广,仅靠阶段性政策和行政推动,难以形成长久而稳定的治理成效。只有把文

化建设中的原则要求落实为制度规范,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固化为长效安排,文化治理才能具备稳定预期和明确依据。法律制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通过完善文化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把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要求落实到具体规范之中,能够不断增强文化治理的规范性。与此同时,法律规范也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制度依托。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只在于制度的建立,更在于制度的执行和运用。只有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手段解决文化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切实提升文化治理水平。

第三,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把握数智技术对文化和传播的重塑作用。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已经使网络空间成为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的重要场所。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相比,算法推荐、流量分发和平台聚合改变了文化资源的配置方式,也改变了主流文化话语进入公众视野、形成社会影响的实现方式。在这一条件下,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已不只是对文化内容进行一般性引导的问题,还关系到传播规则由谁制定、注意力如何分配、价值排序依据何种标准等更深层的问题。目前短视频平台多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容易推动文化传播向感官刺激和碎片消费倾斜,从而对主流价值传播的权威性形成冲击。因此,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不能仅仅把技术看作工具,更应看到数智技术已经深度融入文化运行过程,并对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在数智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把政治引领与技术治理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空间文化方向的引导,健全平台内容治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和舆情引导等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提升对平台运行规律、算法筛选机制,使治理能够从事后应对转向前端规范。只有把主流价值引领贯穿于数字传播机制之中,推动技术赋权始终服务于正确导向,才能推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维护网络空间良

好文化生态。

五、结语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自我展开、自我整合、自我更新的根本机制,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支点性力量。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也关乎民族精神独立性和人民精神世界的塑造。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关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方向与质量,也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引领、精神凝聚和文化支撑。党的文化领导权之所以具有全局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贯通起来,使文化发展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环境复杂,社会思想状况发生深刻变化,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需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牢牢把握文化发展方向。只有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贯穿于理论武装、价值塑造、文化遗产、公共服务、国际传播和文化治理全过程,才能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精神认同感,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十五五”时期实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33]。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 [2] 张鹏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研究述评[JOL].四川行政学院学报,1-11[2026-03-17].<https://link.cnki.net/urlid/51.1537.D.20251230.1513.002>.
- [3] 束锦.毛泽东开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12): 120-133.
- [4] 吴肖兵.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文

- 化领导权的形成与确立[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5(11):26-32.
- [5]蔡佳卉,张海防.“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流变与建设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4):4-10.
- [6]赵乐.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建构、历史演进与实践理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4):11-14.
- [7]麻磊.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出场语境与实践自觉[J].社会主义研究,2025(5):80-88.
- [8]陆寒.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探赜[J/OL].阅江学刊,1-13[2026-03-17].<https://doi.org/10.13878/j.cnki.yjxk.20260212.001>.
- [9]吴林龙,马浩冉.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本质蕴含、主要成就与推进路径[J].重庆社会科学,2025(3):79-93.
- [10]王岩,杨鑫.数智技术赋能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5(6):170-182,219.
- [11]朱继东,李泽中.牢牢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J].前线,2025(12):29-32.
- [12]张琛,王涛.以数智技术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客观必然、基本特征与实践路径[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6(1):48-55.
- [13]王岩,高天赐.数智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1):45-57,151-152.
-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7.
-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 [1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8.
-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张邦辉,宋立坤.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要求[J].重庆社会科学,2024(12):6-19.
- [1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0]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61.
- [21]朱熹,集注;陈戌国,标点.四书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8.
- [2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07.
- [23]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182.
- [2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
-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2.
-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
- [2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7.
- [29]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28.
- [3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1.
-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1.
- [3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 [3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3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19.

-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8.
- [3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1).
- [37]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
- [3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 [39]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

The Generative Logic, Core Ess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e in the New Era

Li Junwen Bai He

Abstract: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e plays a directional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guid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ts generative logic originates from the Marxist view of culture, while also being deeply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empered thr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core essence of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e in the new era lies in building a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strong cohesion and leading capacity. This is manifested in firmly maintai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ideological work,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upholding a clear political stance. To uphold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guidance over the direction and overall configura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o tak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as a major objective.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e in the new era carries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building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f Culture;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易晓艳)